

“睡”在京城 何诚斌专栏

犯困,性也

古人说：“食色，性也。”犯困，也是人的本性。人几天不吃，能挺得住，而几天不睡觉就很难挺住。睡觉时，人体减慢了食物消化和热量释放，不少从地震中奇迹般生还的人，靠的就是睡觉，睡觉保护了体能，排除了恐惧，遗忘了时间。

周扒皮是个不懂人性的家伙，半夜鸡叫，骗长工们起来干活，而长工们犯困他就骂人家偷懒，扣工钱。这反人性的物种挨揍是活该！像周扒皮这样以为自己会学鸡叫很聪明实则十分愚蠢的人，并没有绝迹，巴不得人像机器一样干活的老板就是周扒皮的投胎转世。

有部电视剧上有段“熬鹰”的情节，土匪对那些贫穷而不愿交待家底的人，采取轮流看守的办法不让他睡觉，被熬的人实在受不了，最后只得接受土匪开出的赎金，签上自己的大名。鹰习性凶猛，刚捉回来后不让它睡觉，一连几天，鹰的野性被消磨。熬鹰，是一次从肉体到心灵对鹰的彻底戕害。土匪对人采取“熬鹰”酷刑，让其妥协，可见铁打的汉子也受不了数天不睡觉的折磨。

我过去的一位同事，下岗后到外地打工，他说每天要是只干八个小时，挣不到多少工资，而加班每小时工钱，比八小时内的每小时要高一些，所以大家都加班。加班加得腰酸背痛，用风油精揉一揉太阳穴，把瞌睡压下去。有个人犯困，被机械绞断了手。我回家讲述了他的艰辛，然后对正在求学、每天只睡六个小时左右的女儿说：“你觉得睡少了是不是？现在不勤奋，将来去打工，永远睡不了好觉！”呀，我也成了周扒皮！多少家长，多少教师，成为周扒皮？！按理教育界的人智商不低，可为什么也老是违反人性呢？

有位文友，是个写稿的快手，向全国各地报刊投稿赚取稿费。他老婆在浙江打工，每天夜里十一点半下班，洗澡收拾，上床睡觉十二点了，第二天五点得起床洗衣，然后上

班。他很同情老婆，可家里又实在需要钱来偿还盖房子的债务，供孩子读大学，还要赡养老人，于是也就一年又一年送老婆去打工。他发疯地写作，是想多挣点钱，好让老婆回家，他的功利性写作，也就不难被我理解了。

一天二十四小时，工作时间内长了，别的时间就少了。八小时上班，八小时睡觉，八小时吃饭、做家务、业余活动等，这是最合理的人性化的分配。为了更充分地体现人性，公司将上班时缩短为六小时，让员工拥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可不少工厂主，简单地将二十四小时扒开，十二小时工作制，两个班轮岗，降低了管理成本。而对于工人来说，时间变成了沉重的石磨，磨掉了他们学习时间、交往时间、娱乐时间、休息时间，磨掉了他们的文化素质、人生情趣和享受天伦的幸福。

有家板材厂，老板怕上夜班的工人偷睡，所以他不惜以牺牲自己的休息为代价，天天值夜班，可白天还要处理事务，一段时间后，他无法盯着人干活了，在车间巡查一番后就坐到值班室打瞌睡。犯困，性也。老板也是人啊！有人发现老板挺不住了，故意去请示，请示那，吵醒他。后来，他放弃了值夜班。没有老板的监督，产量反而多了，因为车间主任通人性，知道工人若不睡好，工作效率不去——上夜班不能超过八小时，而且不能连续上一个星期——主任的建议被老板采纳。那些只知道熬夜对身体有伤害，却不愿对工人进行劳动保护的人，自以为会算账，能够掌控他人的时间，其实和周扒皮一样，弱智得很。



桐城以文名世。说起桐城，人们想到的总是文人雅士、硕学通儒，或者因“学而优则仕”而立朝治国的能臣显宦。很少有人能把桐城人与侠肝义胆、慷慨赴死之类的豪杰壮举联系起来。

然而，王胜就是这样一个人。王胜（1324—1363），字均德，元末桐城人。

元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民族矛盾极其冲突的朝代，元朝的大帝们自知以外族之身份，统治着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大汉族民，他们坐在金銮殿上的屁股始终如坐针毡，他们惴惴不安的心只有靠着更加极端的强权高压来维持其始终岌岌可危的统治。

然而，人，是压不住的。恰恰相反，强权高压只能激起更大的民愤。覆舟之水一直暗流涌动，到元朝末年，那暗流更是风起云涌，遍地潮头。

在我的家乡桐城，就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乡民们为了推翻元朝的极权统治，于某年的中秋之夜，先用月饼传递消息，内藏“中秋夜，杀鞑子”的纸条，然后一齐动手，用那还没来得及收缴的菜刀砍了元朝官兵，举起了反抗的义旗。

这个“中秋夜，杀鞑子”的故事，流传之地不止桐城一处。然而桐城这个民间传说，我想八成与王胜有关。因为王胜就是元朝末年在桐城拉起义军，参与推翻元朝统治之人。

史载王胜“少骁勇，喜兵法，胆略过人。”被称为“大刀王胜”，想必在十八般武艺中是最擅于“刀法”的。元至正年间，明太祖朱元璋的起义军打到长江一带。王胜便领着手下千余人投奔而去。我设想在投奔前他们肯定是在家乡先杀一通鞑子过瘾的，这杀鞑子的过程被加工演义，就成了月饼传书，“中秋夜，杀鞑子”的有声有色的故事了。

话说带了千余人马的王胜投奔朱部之

桐城历史人物 白梦专栏

死士王胜

后，“从战有功，太祖用为右副元帅”。

关于他的“从战有功”，史书无多少细节记载，只说在至正二十一年那场朱元璋打败陈友谅夺取江州的战役中，王胜是有功劳的，得“赐金带一，良马一”。

不知这“右副元帅”到底是多大的官。历史之所以给王胜地位，我觉得与这“右副元帅”没多大关系，有关系的恐怕还是他的“死士”行为。

至正二十三年（1363），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大战数个回合。其时，陈友谅兵力强盛，舰船高大，他又是渔家出身，谙熟水性。所以，最初的几个回合，朱元璋都没占上风。最后是那熟知兵法的刘基想出了“诈降”和“火攻”之策。于是，招募死士来完成这个任务。王胜慷慨应募，同时应募的一共有35人。临行前，朱元璋还免不了假惺惺地说几句：“诸位壮士，此行甚险，恐不能生还。”王胜慨然答到：“应死募，岂有生心乎？”于是35人假意投降陈友谅，然后在某个月黑风高之夜，纵火烧了陈友谅的老营。这边大军趁发起总攻，陈友谅大败。此一战，大挫陈友谅部，奠定了太祖的大明基业。而包括王胜在内的35名“死士”尽皆葬身火海。

太祖定都立国之后，没忘了这批侠肝义胆的忠良将士，在鄱阳湖中的康郎山上为他们立庙祭祀，并封侯赐爵，以彰其功。王胜被封太原郡侯，赠怀远大将军称号。并在他的家乡赐封他一大片土地以抚恤其家

属。那片土地就在桐城孔城镇的白兔河边，名曰“养马圩”。遗址至今尚存。

“时势造英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王胜的事迹很好地印证了这两句名言。文章之邦的桐城，也非都出天生“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当乱世之时，水火之际，那跨马横刀，掷臂一呼的豪杰之士，也会应运而生，应时而出。

与王胜同时之人，桐城还有一位勇士，姓黄名荣六，小名六儿。他和王胜不同之处是没有投身火热的战场，而是选择留在了家乡，担当起了保家护民的责任。在那兵荒马乱的至正年间，他募乡勇，筑城堡，既反鞑虏，又抗流寇盗贼。他筑的城堡就在离桐城城区西南11公里的蒋家山一带，方圆六平方公里，轮廓至今清晰可辨。每逢祸乱，远近之人尽皆来此躲避。被保护的乡民们感恩戴德，将城堡命名为“六儿城”。

六儿就是与王胜不同，他不仅当年没有弃家投军，太祖定都之后，褒他护民有功，要给他赐爵封赏，他竟也不受。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民间立场，煞是令人敬佩。



白梦

湖边童年 刘鹏程专栏

湖水是一面镜子

我不知道古人为什么要用铜做镜子，水不就是很好的镜子吗？现代人为什么又总要用玻璃做镜子？他们一定是遗忘了水，多么柔软的水啊。

我们所见到的考古出土的铜镜，早已经锈迹斑斑，看不出历史的影子了。而现在，面对玻璃镜子，我们往往总是小心翼翼，以免碰碎。但是，现实里破镜总是难免的，我们也总是被它坚硬而锋利的碎片，刺痛过几多美好的心情。

一直以来，我就是以水为镜子。确切地说，是我以故乡的湖水为镜子。

我出生在大湖的边上，湖水曾经照着我整个的童年。现在，通过湖水，我还能看见我赤裸的童年，是那样的清晰而透彻。这是夏天的湖水，一面偌大的镜子。两岸的青山倒映在湖水里。母亲们在湖边洗衣，她们以水为镜，在水边梳妆。古典的帆船，摇曳在湖水的中央。我的童年就定格在这

透明的湖水里。

春水往往有些浑浊，但这丝毫不会影响我们。相反，我们从中看见了水奔跑的过程，水从天上哗啦啦落下，从山脊上纷纷滑过，从小溪里潺潺流来。从春天的湖水里，我们看见了绿意，看见了万物的生机。草开始返青，鱼开始苏醒，我们也开始了一生的向往。

而秋水是澄明的，沉静而深邃。秋水的映照更令人透彻，三三两两的几片落叶，漂在水面，更像一个人中年的心境。人到中年的时候，往往更需要水的照耀。古往今来，有多少人能够望穿秋水呢？小的时候，我们不懂秋水，只感觉到湖水微微的凉意。我们跳入秋天的湖水，懵懂地打破它的沉静，喧闹在一望无际的深邃里。

冬天的湖水有时候结满了厚厚的冰层，它照不出我们的影子，我们只能看见冰面下冻结的鱼，像我们小学课本里的标

本。但是，我们知道这象征着一年的终结，我们从这里盼望着过年，以及又一个春天的到来。

现在，生活让我远离了湖水。面对城市坚硬的钢筋水泥，好久的一段时间，我丢失了一面镜子。我因此看不清自己的模样，也看不清自己的影子，是城市里那些虚幻而闪烁的霓虹，覆盖了我们内心的远景。然而，湖水依然在远方，在故乡的怀抱里，映照。那里面依然有我的影子，有我出发的影子，也有一条清澈的路，等待着我的回归。

是啊，现代城市的生活，让我们的思想变得愈来愈坚硬，而我们的心理，更需要湖水柔软的抚慰。也因为湖水的映照，我们的生命会更加清晰而透彻。

湖水，这一面偌大的镜子，是那样的深邃，它仿佛照着我的前生和后世。



刘鹏程

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坎坷常苦辛。

这是一首难解的诗。我说的解诗，不是要做庖丁，支解一首作为客体对象的诗，而是试图追索自身何以会被一首诗打动，并尝试理解它。易经云，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宅。一首诗在我们内心亦可引发如是的震动，在这样的震动中，一些自以为是的坚壳悄然解体，而幽闭的百果草木也都生根发芽了。

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首二句就已经定下了全诗略显暖昧的基调。“难具陈”，是因为那宴会上的欢乐不单关乎物质吗？在莱辛《恩斯特与法尔克》的第四篇谈话末尾，那位年轻的共济会员答应留下来吃晚餐，他说：“我大概不得不留下了，因为我渴望双重的满足。”但凡一场“良宴会”，令人期待的就是这种“双重的满足”，饮食与交谈，口服之欲和思想交流，精神满足与物质满足，从来都相濡以沫。我们都憧憬柏拉图所记录的雅典人的会饮，那似乎是这种“双重满足”的典范，但艾伦·布鲁姆告诉我们，那场宴会恰恰发生在一场摧毁性的战争期间，当时的雅典已经注定要陷落了，但“这些学者并没有陷于文化的绝望，他们纵情于对自然的欢乐恰恰证明了人类最优秀的生存能力，

过去时代的诗与人 张定浩专栏

今日良宴会

证明了人独立于命运的驱使，不屈从于环境的胁迫”。十九首多写于东汉末年，也是礼崩乐坏的乱世，但在我想来，那些不知名的汉代的会饮者，亦有不亚于古希腊人那般的风度。

诗人可以尽力使用文字，铺陈食物的丰富、食器的精美，甚至弹琴者的姿态，但我们依旧不能感受到他所感受的全部欢乐。这是文字的局限，一切文学都是在努力抗击这样的局限，但反过来，当诗人意识到文字的局限，放弃这种抗击，承认表达的艰难，“欢乐难具陈”，当他清清淡淡说出这样诚实的话，我们距离他内心的欢乐却又近了一步。

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所谓最高程度的真理，都不是眼睛见到，而是耳朵听到。先秦文献里常有“人亦有言”的说法，即我听到有人这么口耳相传，我信任它，超过对自己其他感官的信任。摩西传下十诫，亦是西奈山上听到神的声音。但那些围坐在一起的会饮者们，需要听到

的，是什么呢？“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诗人唠唠叨叨半天，不惜犯重，竟还没有说明，但黄侃却对这十个字大加赞赏：“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此可为十九首之总赞，所以历千古而光景常新也。”这该怎么说呢，我想，是不是好比年轻时候第一次恋爱，那种吞吞吐吐、颠三倒四、欲言又止的神情，努力地搜肠刮肚，寻找措辞，还以为自己正要说的，是对方一直蒙在鼓里的秘密，其实呢，对面的那个人或者也正和自己一般的慌乱，两个人什么都没谈，却什么都晓得了，很多年后，当时说的话全然忘记，但那时那刻的情状却历历如新。后世有梅尧臣所谓“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意境，和“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虽有点像，但骨子里已经是情场老手的做派了。

凡是美好的会饮，都只能在朋友之间才会发生。按照柏拉图的说法，人与人之间最自主完满

的关系，是朋友之间的真正友情，这友情建立在对于善的共同思索上。

“人生寄一世”以下六句，似乎可视作这种“对于善的思索”的外在表达，和孔子所谓“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有相通之处。人生苦短，急求功名富贵，勿守贫贱苦辛，和朋友作这样直白浅露的功利谈论，似乎有些俗气，但反躬自问，我们尽可以对自己有种种严格的要求，但对于身边的朋友，是不是都会作种种世俗的关怀，希望其尽可能拥有并非贫贱苦辛的生活？再完善严苛的道德律，都只能用来正己，用来要求旁人，就会出问题。宴会中的歌，是唱给众人听的，不能不有所注意。因此，这六句“高言”，并非自我愤激的反语，而是待人时的诚实，只不过，通过这样的诚实，一些秘密却得以保存，潜藏于“识曲者”的心中，作为友情的根基。



张定浩